

清华大学中文系

# 清华大学

## 古代汉文学论集

汉武帝与儒家诗教○读白诗札记○吕本中交游诗人考○梁启超的词学研究○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嵇康与文士道教○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关于胡适的两部文学史著作○龙的实质和龙神话的起源○《淮南子》神话钩沉○从敦煌本共住修道故事看唐代佛教诗歌文体的来源○文体特征发育与古代小说演进○节烈贞女和妻妾

「情痴」：从《空谷香》到《香祖楼》○论晚清政治乌托邦小说○《孟子·告子章句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发微○《淮南子》中所见先秦文献考○明代晋潘刻书研究○戴震《续方言》手稿及其考证○二十世纪前期词籍汇刊叙录○寒食不入日本考○《文集百首》句题与白居易的闲适诗○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中華書局

# 清华大学古代汉文学论集

清华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

2005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大学古代汉文学论集/清华大学中文系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ISBN 7-101-04587-1

I. 清… II. 清… III. 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785 号

- 
- |      |                                                                                                                            |
|------|----------------------------------------------------------------------------------------------------------------------------|
| 书 名  | 清华大学古代汉文学论集                                                                                                                |
| 编 者  | 清华大学中文系                                                                                                                    |
| 责任编辑 | 舒 琴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br>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br>印张 16 字数 329 千字                                                                                   |
| 印 数  | 1 - 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587-1/I · 600                                                                                                 |
| 定 价  | 36.00 元                                                                                                                    |
-

##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它以整理和发掘民族文学遗产为职责，像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一样，一直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它是这两大齿轮中的润滑剂，微薄、柔弱，但却维系了两者的咬合和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它遭受了挤压，也获得自我更新。

清华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就是这一意义上的新的集体。在其身后，有过一段堪称辉煌的历史——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优秀学者，曾经在这里长期执教。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85年中文系复建，几十年间，学科传统几乎中断。现在，经过艰难的发展，这一学科终于聚集起12名成员——来自北京、南京、上海、扬州、西安、武汉、东京、京都等地高校的9名博士和3名硕士。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学术，它期望有所贡献，于是检点自己的队伍，编成了这部论文集。

它期望贡献什么呢？首先，它想表达对于优良传统的归顺。国学前辈们留下了宽广的学术视野、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勇于开辟的精神，它将以此为立身之本。它懂得“君子不器，道

未始有封”的道理，因而注意专精与广博的结合，注意以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以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它知道学术的本质就是认识资料，一切学术创新都肇始于资料范围和处理资料之手段的更新，因而重视通过资料建设来提升研究的境界和方法。现在，它已经作过一些尝试了：尝试把考据学和其它学科手段结合起来，尝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音乐学、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艺术史、科技史等学科相沟通，尝试域外汉文学研究、“飞地文学”研究、口头文体与书面文体的比较研究等新的学术思路。这些尝试有必要继续。为此，它将发扬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等人的浪漫风格，使每一项具体的探索，都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洋溢。

其次，它期望体现 21 世纪的学术智慧。当各国学者的学术实践逐步凝结为种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就获得了新的观察事物的眼光。这样就成长起一批善于“预流”的研究者。它是其中的团体成员。现在，它已经对哲学、宗教学、中西比较诗学等领域有所涉及，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分析相结合，对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若干新的、富于创见的阐释。比如，在汉代至宋代的诗歌研究、诗词关系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诗学思想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成果。它并且注意把文学问题与古代思想史问题联系起来，把研究对象放在中国诗史、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中去体察，发现那些具有长时段、重复性特征的现象，加以透彻的解释。显而易见，这是一项方兴未艾的

事业。它有信心做好这一切。它将用朝气蓬勃的步伐，在这条年轻的大道上迈进。

再次，它期望寻找到属于中国人的独特的文学研究方式。它认为，方法是研究主体同研究对象的一种契合。中国人素有远大的学术关怀；与此同时，他们又有雄厚的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学创造；既然如此，他们就应当有自己的学术作风。它有志于通过学术实践和学术批判，找到这一意义上的自我。它为此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比如在研究中唐诗歌和诗人的时候，它曾经把不同的诗史时段相比较，揭示其各自独特的价值；它曾经以诗人的感受方式、表现方式为核心，从心态史、时空观念、意象结构等不同视角进行透视，实验了一种新的诗史研究思路。又如在研究清代诗学的时候，它尝试了文献学、社会史、文体批评的结合，也就是周密的资料基础、综合分析的眼光、独特的文学问题的结合。它用这样的追求避免了取巧与趋时，使学术思考更加深刻。也许，它将进一步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这一期望，建设一个中国文学史的新范式，即社会史研究和文体史研究相结合的范式。

清华大学有校训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是天的品格，宜为所有新生的事物所效法；“载物”是地的品格，宜为所有成熟的事物所具备。清华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还很弱小，所以它有上述自我期许。这是守望者、耕耘者的自我期许，故不敢太大，也不敢太小。考虑到它的研究对象虽然涉及若干中国少数民族，却以汉语言文学为主体；也考虑到它的学术视野已经超出国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所能范

围——它于是以《清华大学古代汉文学论集》为本书书名。这个书名意味着一种新的时空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汉文学是汉字文化区的文学，分布在东亚、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汉文学是汉字文化区和华侨居住区的文学，遍布世界各地。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理应有“汉文学”的胸怀，理应注意到文学与文化的并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其他同仁一起，守护好地球上最丰厚的一份文化遗产，守护好这个通过汉语言文字而团结起来的整体的历史。

# 目 录

## □诗学研究

- 汉武帝与儒家诗教·····孙明君 (1)
- 读白诗札记·····谢思炜 (20)
- 吕本中交游诗人考·····谢思炜 (52)
- 梁启超的词学研究·····刘 石 (72)

## □作家作品研究

-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孙明君 (97)
- 嵇康与文士道教·····孙明君 (117)
-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谢思炜 (135)
- 关于胡适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刘 石 (149)

## □神话研究

- 龙的实质和龙神话的起源·····王小盾 (171)
- 《淮南子》神话钩沉·····马庆洲 (191)

## □通俗文学研究

- 从敦煌本共住修道故事看唐代佛教诗歌文体的来源  
·····王小盾 (216)

- 文体特征发育与古代小说演进……………丁 夏(255)
- 节烈贞女和妻妾“情痴”:从《空谷香》到《香祖楼》  
……………林叶青(263)
- 论晚清政治乌托邦小说……………郭 蓁(278)

## □文献研究

- 《孟子·告子章句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发微  
……………杨 氏(328)
- 《淮南子》中所见先秦文献考……………马庆洲(341)
- 明代晋藩刻书研究……………刘 菁(379)
- 戴震《续方言》手稿及其考证……………刘 菁(390)
- 二十世纪前期词籍汇刊叙录……………刘 石(401)

## □域外汉文学研究

- 寒食不入日本考……………刘晓峰(427)
- 《文集百首》句题与白居易的闲适诗……………隼雪艳(450)
- 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王小盾(468)

- 附:论文集作者简介……………(497)

## 汉武帝与儒家诗教

● 孙明君

班固评价汉武帝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祀，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相较而言，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武功韬略前人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武帝在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汉武帝与儒家诗教、中国诗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探讨汉武帝与儒家诗教及中国诗史之间的深层关系。

—

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时代，中国政治会是什么格局，很难逆

料。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时代，中国诗史将会有什么走向也很难逆料。武帝时代对中国诗史最大的影响就是儒家诗教从理论形态落实到了现实政治层面。

诗教，也可以说是儒家诗教，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它最初的意义是文本的《诗》之教，后来由文本的《诗》转化为文体的诗。形成于先秦时代的儒家诗教，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异，到了两汉时代出现了新的面目。经过了汉武帝时代之后，儒家诗教终于定型。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儒家诗教对中国诗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乃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通常会引经据典地说，诗教是上古时代圣明君主教育贵族子弟的法宝。《周礼·春官宗伯》中说：“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尚书·尧典》中记载有舜对夔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律。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的“诗言志”被后人视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这里的诗、歌、声、律都在乐的范围之内，一般说来，在儒家的观念中，诗和乐、诗教和乐教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只是，今天的学者不再相信这段话真的出现在尧舜时代，它很可能出自春秋战国时代儒士的想象。早在汉帝国建立初期，受儒家观念影响的士人就对统治者提出了重视乐教的建议。贾谊《新书·审微》曰：“孔子闻之曰：‘夫乐者所以载国，

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虽然将乐的作用夸大到足以亡国亡君的高度，但大汉初定，不仅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的乐教上去，就是对儒家的学说也没有给予更多的青睐。

儒家诗教真正被帝王重视是在武帝时代。汉初，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黄老之学成为其指导思想，出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赞》）的局面。武帝上台后，以前的理论已经不适合于时代，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寻找一种新的指导思想，不仅要用它来解决汉初的社会问题，而且要用它来作为帝国长治久安的根本纲领。他接受的是改良之后儒家思想——儒术。《汉书·武帝纪》：“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罢黜了法家、纵横家等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理论之后，汉武帝毅然选择了儒家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举措，儒家诗教也是儒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儒家诗教从幕后走向前台、从理论走向现实是以雄才大略的武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与以旷世大儒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士之间合力的结果。《汉书·董仲舒传》详细记载了武帝与仲舒君臣之间的对答：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

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武帝是从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高度提问的，他夜以继日地思考着这些最为重大的问题。他想听到高明者的分析、判断、指点，其态度是诚恳的。显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天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到了制度、乐教与天下安定之间的关系。董仲舒所阐述的治国策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只有儒家思想可以救大汉帝国。他的思想体系中治国之道也分为阴阳两面，阴为刑法，阳为道德。道德分为仁义礼乐。乐即乐教，当然是包括诗教在内的。在刑法与道德之间，应该任道德而不任刑法。礼乐是教化的根本，特别是乐不仅可以改变民风，更化民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汉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只有恢复了儒家思想，任用儒士，独尊儒术，汉帝国就一定会维持大一统政治。

董仲舒的思想不是孤立的。儒家的乐教——诗教观虽然未能得到统治者的接受贯彻，但它一直在发展中，并且在发展中不断增添着新的色彩。汉儒之音乐——文学经典《礼记·乐记》《毛诗序》都完成于武帝时代，绝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时代的产物。它们的首要特征是反复强调音乐、诗学对于政治教化的重要性。《礼记·乐记》重视礼乐，并建议统治者重视礼乐，因为礼乐与政治教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士的共同认识。其中对君臣之道的强调，对上下之和的强调，

对民治的强调则明显带有大一统时代的时代特征。

最高统治者既然有这种渴望,时代的精英们既然有这样的建议,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高悬于理想形态中的儒家诗教便进入了现实政治层面。《礼记·乐记》《毛诗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观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诗坛的主导思想,儒家的诗歌理论便成为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五帝三王制礼作乐的神话,只有博古通今的儒士知道它的真假。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是如何实行乐教的,儒士们其实也难以说清。从春秋开始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没有统治者能够在现实政治中推行过乐教诗教,连口头上接受的帝王也很少见,也许可以说武帝是把诗教理论落诗到现实政治中的第一位帝王吧。在儒家诗教发展史上,武帝的功绩几乎与孔子相当。如果没有武帝,儒家诗教也许永远只是一种被部分知识分子念念叨叨的理论,不会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即使会受到后世统治者的赏识,一定会晚很多年,这是无疑的。

从制度的层面看,武帝最大的贡献是“兴乐府”。班固先后多次强调武帝“立”乐府之史实。《两都赋序》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这里用的是“兴”,还不足以说明武帝的贡献,在《汉书》中他直接使用了“立”字:《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曰:“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乐府果真是武帝始立的吗?后来的学者多有怀疑,首先,

人们在《史记·乐书》中可以看到：“孝惠、孝文、孝景，五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班固在《汉书》中有自相矛盾的说法。《汉书·礼乐志》云：“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既然有乐府令，则必然有乐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这里就说得 very 清楚了，秦汉时代少府的属下的确有乐府一职。宋人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开始怀疑武帝立乐府的可能性，提出乐府之立“似非始于武帝”，后来响应者甚众。到了1977年，在秦始皇陵墓附近出土的秦代文物中，有一错金甬钟，其钟柄上刻有“乐府”两字，研究者认为它的出现为秦代有乐府机构存在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物证。至此几乎可以否定武帝立乐府的说法了。但我以为还不能这样武断。我们所掌握的武帝未立乐府的证据，除了考古上的“物证”之外，主要的证据来自《史记》《汉书》，对《史记》的熟悉，没有几个人可以和班固相比，而《汉书》就是班固的心血之结晶。那个“物证”也没有超出《汉书》的范畴。所以我以为，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自作聪明地去否定班固，而是去理解班固为什么多次说出武帝立乐府的话语。

当代学者中也有人坚持武帝立乐府的说法，王运熙先生说：“隶属少府的乐府，系武帝所创立；隶属奉常的太乐，则汉初早已设立。……汉魏六朝人的记载，往往把太乐官署简称为乐府，因而又称太乐令为乐府令。《史记》《汉书》所载

武帝以前的‘乐府’和‘乐府令’，实指‘太乐’和‘太乐令’。”<sup>①</sup>罗义俊先生说：“据《汉书·礼乐志》，高帝唐山夫人作有《房中祠乐》；惠帝二年命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为《安世乐》。这里的乐府令，为太常太乐的属官，是与周秦时代性质相同的乐官，并不是专门的文学机构。乐府令掌管的乃是‘雅乐’，即郊庙朝会的贵族乐章，与‘俗乐’即民间的歌谣还没有发生关系。文景时代，其性质并无更改，乐官仍学习旧乐。到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始在掌管雅乐的太乐官署之外，另在上林苑中创立乐府官署，掌管俗乐，负责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sup>②</sup>以上两种说法似乎可以解决《汉书》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既然我们有了出土文物作证据，又有《汉书·百官公卿表》证明少府属下的乐府乃是秦官，所以武帝创立乐府说很难成立。我的理解是，隶属于奉常的太乐、隶属于少府的乐府在武帝之前都已经存在。太乐的职责是负责宗庙礼仪所用之乐，此乐为传统的雅乐；少府既然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其属下的乐府也是直接为帝王服务的乐官，太医负责帝王的肉体健康，乐府则负责帝王的精神享受。到了武帝时，他扩大了乐府的职能，由私人享乐的机构变为国家政教的机关，成为推行其政治教化思想的重要堡垒。武帝这样做是有历史依据的，在汉儒看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礼乐志》）“采诗，依古遵人徇路，采取百姓歌谣，以知政教得失也。”（颜师古注《汉书·礼

①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② 罗义俊：《汉武帝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乐志》)古代是否真有采诗之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士说有,独尊儒术的武帝为了推行其政治教化愿意相信其有,也愿意在现实中尝试。所以就有了以观风俗、知厚薄为目的的乐府。这就是汉武帝立乐府的过程。

从儒家的角度看,武帝立乐府是一项兴废继绝的举措,它使传说中的采诗故事变成为现实。武帝是否从乐府诗中达到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应该说汉乐府中包含的内容的确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战城南》反映了武帝时的战争,《出东门》反映了城市贫民走投无路之时,铤而走险的故事。如果武帝听到了这样的诗歌一定会对他有所触动,他能够把这样的诗歌收集起来保存起来也可以看出他胸襟的博大。

汉赋是一代文学的标志,散体大赋是其中的正宗。大赋的发展与武帝的喜爱、提倡密不可分。在武帝之前,占据赋坛主流的是骚体赋,它所宣泄的是个人的遭遇感受,与“体国经野”、“润色鸿业”的散体大赋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班固《两都赋序》云: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